

战国策译注

王延栋 译注



国民阅读经典

战国策译注

王延栋 译注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国策译注/王延栋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7.1
(国民阅读经典)
ISBN 978-7-101-11957-2

I . 战… II . 王… III . ①中国历史-战国时代-史籍②《战国策》-译文③《战国策》-注释 IV . K231.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49298 号

书 名 战国策译注
译 注 者 王延栋
丛 书 名 国民阅读经典
责任编辑 余 琦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3/8} 字数 260 千字
印 数 1-8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1957-2
定 价 32.00 元

出版说明

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代中国，国民的阅读生活中最迫切的事情是什么？我们的回答是：阅读经典！

在承担着国民基础知识体系构建的中国基础教育被功利和应试扭曲了的今天，我们要阅读经典；当数字化、网络化带来的“信息爆炸”占领人们的头脑、占用人们的时间时，我们要阅读经典；当中华民族迈向和平崛起、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时，我们更要阅读经典。

经典是我们知识体系的根基，是精神世界的家园，是走向未来的起点。这就是我们编选这套《国民阅读经典》丛书的缘起，也因此决定了这套丛书的几个特点：

首先，入选的经典是指古今中外人文社科领域的名著。世界的眼光、历史的观点和中国的根基，是我们编选这套丛书的三个基本的立足点。

第二，入选的经典，不是指某时某地某一专业领域之内的重要著作，而是指历经岁月的淘洗、汇聚人类最重要的精神创造和知识积累的基础名著，都是人人应读、必读和常读的名著。我们从中精选出一百部，分辑出版。

第三，入选的经典，我们坚持优中选优的原则，尽量选择最好

的版本，选择最好的注本或译本。

我们真诚地希望，这套经典丛书能够进入你的生活，相伴你的左右。

中华书局编辑部

二〇一二年四月



战国策导读



《战国策》这部名著，可以说用不着介绍。它跟《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书一样，又是历史，又是文学，具有中国文化常识的读者都知道它。它里面的一些故事、寓言等等早已凝结为一些常见的成语，人们从小听故事，看儿童读物总会听见、碰着、用到，只不过不知道出于《战国策》而已。学校的语文课本也选有《战国策》篇目。

《战国策》这部名著，也可以说需要认真介绍。要想对《战国策》作一全面的概括性说明、评估，确非易事。在我与张清常先生合著的《战国策笺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中，先生写过一篇精彩的《前言》，这篇文章以《战国策评估》为题，发表在《南开学报》1993年第3期上，尔后又被《光明日报》和《新华文摘》部分地转载。面对先生这篇《前言》，让我重起炉灶再写一篇，确实感到有些茫然和束手无策，大有“黔驴技穷”之感。索性以彼《前言》代此《导读》吧，以示对先生的感念和告慰。先生曰：

战国（前475—前221年）曾被古人称之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王夫之《读通鉴论》）。它是中国历史上最美好的时代之一，也是最丑恶的时代之一；它是人类最高智慧的光辉夺目的时代之一，也是蒙昧愚蠢

的时代之一；它是中国哲学、文学、艺术、政治、法律、经济学说和自然科学理论及技术（尤其在冶炼、水利、农业、武器、战备、医学等方面）突飞猛进、文化昌盛的光明季节，也是统治者对人民施加残暴镇压的黑暗季节；它是人类对未来满怀着美好希望，人才辈出的春天，也是二百五十四年战祸连绵，千千万万人民遭到屠杀的冬天；它是国王、大臣等统治阶级横征暴敛，肆意霸占一切，无恶不作，飞扬跋扈，荒淫奢侈，视人命如草芥，过着人间天堂生活的日子，也是劳动人民备受欺侮压迫，挨饿受冻，生命毫无保障，贫困到一无所有，过着人间地狱生活的日子。使人感到惊讶的是：那时代伟大的思想和美好的希望仍然鼓舞着现代中国和世界，那时代的污泥浊水至今仍未涤荡干净。

这二百五十四年真是个奇特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产物《战国策》也是先秦奇书之一。

《战国策》是古代按国别来编排的史料汇编之一种，编辑了战国时期纵横家以及一般智谋之士的游说、出谋划策之辞和诡诈权变故事，也是若干重要的战国人物、史实的记载。这类书原有许多种名目和本子：《国策》《国事》《事语》《短长》《长书》《修书》。时代有的下延到楚、汉之际。西汉末年刘向（前79—前8年）加以整理定为《战国策》三十三篇。可能刘向把下限放宽，兼收了西汉初蒯通、邹阳等的材料？也可能是后人顾名思义而把战国以后的蒯通等人的材料剔出去？阙疑。

《战国策》的“策”，据《说文》本义是赶马所用的工具，近似马鞭一类的东西，被借为竹片木片简册之“策”。古代的策（册）长二尺四寸（见《仪礼·聘礼》）。一百个字的材料就使用它来写（见伪孔安国《尚书·序》疏）。王国维《简牍检署考》特别提到《战国策》的问题：“窃疑周、秦游士甚重此书。以策书之，故名为《策》；以其札一长一短，故谓之《短长》；比尺籍短书，其简独长，故谓之《长书》《修书》。刘向以‘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定其名曰《战

国策》，以‘策’为策谋之策，盖已非此书命名之本义。”王氏说基本正确，但“策”作为计谋来使用，已见于《吕氏春秋·简选》“此胜之一策也”。所以后代才会产生：策略、策划、国策、政策、对策、决策、划策、画策、计策、献策、良策、妙策、上策下策、失策、群策群力等。

《战国策》在历代图书目录中，有两种安排：一种是放在史部杂史，一种是放在子部的纵横家。前者如《汉书·艺文志》在春秋家。唐代《隋书·经籍志》认为《战国策》“其属辞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备而存之，谓之杂史”。五代《唐书·经籍志》、北宋《新唐书·艺文志》、南宋《通志·艺文略》、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均如此。另一种安排始于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认为“历代以其纪诸国事，载于史类。予谓其纪事不皆实录，难尽信，盖出于学纵横者所著，当附于纵横家”。宋、元间《文献通考·经籍考》列于纵横家，元代《宋史·艺文志》、明代《百川书志》同。

在过去，《战国策》一直是既被称赞“其文辨博，有焕而明，有婉而微，有约而深，太史公之所考本也”（鲍彪《战国策注序》），又被痛加诋毁的。刘向说《战国策》的内容均非正道，但“亦可喜，皆可观”（《校战国策书录》）。北宋曾巩（1019—1083年）痛斥战国游说之士，对于《战国策》这种充斥了“邪说”的书采取了“放而绝之”的态度（《重校战国策序》）。元代吴师道在《曾序跋》中评论说：“是书善恶无所是非，而作者又时出所见，不但记载之，为谈季子之金多位高，则沾沾动色；语安陵嬖人之固宠，则以江乙为善谋，此其最陋者。”（按：《秦策·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章，苏秦问：“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答：“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又《楚策·江乙说于安陵君》章：“江乙可谓善谋，安陵君可谓知时矣。”就事论事，前章的描写和后章的评论，没有多大的问题。）明代王廷相抨击《战国策》：“摄权变以钩利，蓄狙诈以交外，幸近小以为得，便苟偷以为安。其心隐忍，其事

欺谩，其术鄙陋委琐，畔于正轨远矣！而时君暗劣，慑于祸患，一切倾心听之，由是兵戈遍于九域，生民涂其肝脑。古昔圣人休静天下之泽，斩然无存。嗟乎！世变至此极矣。”（《校战国策序》）清朝陆陇其说：“《战国策》一书，大抵皆纵横家言也。其文章之奇，足以悦人耳目；而其机变之巧，足以坏人心术。子弟识见未定而读之，其不为之渐染者鲜矣。”（《三鱼堂文集·战国策去毒跋》）总之，《战国策》在正统思想的笼罩下，它是难以抬头的。今天，我们应该还给它一个比较切实的评价。

《战国策》主要记载战国时期谋臣策士游说各国国君与执政者，或者相互辩论时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以及相互倾轧的阴谋诡计等等。这些，充分反映了当时各诸侯国、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所以《战国策》是研究战国史的重要资料之一，司马迁《史记》就曾采用了它。

《战国策》大量收录纵横家搞权变谋诈的佚事与说辞，其中有真有假，有虚有实。这里面包括了后来纵横家追述前辈的游说之辞，或者假托前辈的名义而编造出一些书信与故事传说等。这些不但未必符合历史真实，而且所述人物和事迹本身就混乱矛盾，当然也还有若干浮夸之辞，难以置信。例如苏秦，年代弄不清楚，说辞所举历史地理情况与实际多有出入，事迹或与苏代、苏厉搅在一起，《齐策》记载苏秦封武贞君，《燕策》记载苏秦封武安君……诸如此类，令人怀疑。司马迁《史记·苏秦列传》也指出：“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现代的历史学家们爬梳史籍，又借助于1973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基本上弄清了苏秦的主要情况。可见《战国策》虽有一些虚拟的东西不能信以为真，有待鉴别，但绝大部分的策文是符合史实的，不可以因噎废食。许慎《说文》，我们对它也会指指点点，说三道四，但幸亏有了它，我们才能比较有些基础来认识甲骨文。同样的道理，如果没有《战国策》的《中山

策》，那么1974年11月河北平山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虽被发掘出来，我们的研究工作恐怕就要白手起家了。

从史料研究的角度看，《战国策》可利用的还很不少。例如：

一、《战国策》确实写了人世间许多不便于说出口的卑鄙肮脏的事情，尤其是诸侯国政治舞台上面的丑恶现象，极其不堪入目，却写得那么逼真，洗练，甚至使人惊心动魄，看穿了这一群衣冠禽兽，这引起了人们的愤慨。但卫道之士却抨击此书“坏人心术”，犹如攻击《水浒》《红楼梦》等诲盗诲淫一样。试想如果没有《战国策》这样比较集中描述的翔实史料和盘托出当时的历史，我们对于伟大诗人屈原的激愤，对于先秦诸子光辉思想的产生，虽能理解但体会不可能这么切实深刻。

二、《战国策》中写了几个太后：《齐策》有赵威后，有君王后；《赵策》有赵太后（是否与赵威后为一人，有争议）；《秦策》《韩策》等有秦宣太后。每个人都活跃于纸上，确是一国之尊。赵威后和君王后的见解、魄力远胜男子，却没有受到应得的赞扬。赵太后大权在手，如果不识大体顾大局，触龙虽有三寸不烂之舌，亦无可奈何。可是一说起此事，便把触龙捧了又捧，夸了又夸，把赵太后降为昏庸老太太；一说到唐太宗发怒而终于纳谏，却不住称赞唐太宗，为何独薄于女而偏厚于男？秦宣太后是最倒霉的，两件事情都被人们用后代压迫、束缚女子的眼光讥笑得极为不堪。殊不知战国距离古代母系社会时期毕竟比宋、元近一些，战国时妇女的社会地位可能比后代略胜一筹，对于男女间的禁忌也略少一些。《战国策》所写秦宣太后的骄横与坦率在当时是不大忌讳的。战国时期这几个掌权的太后也正是汉朝吕后、北魏胡太后和唐朝武则天的先导。

三、战国二百五十四年间各诸侯国之间的矛盾斗争是很尖锐激烈的。除了战争之外，还有外交战线的斗智。《战国策》保留的这方面史料很多，有许多是非常精彩的。例如《齐策》里面有《邯郸之难》《南

梁之难》两章，齐国君臣商讨对于前来请求援助的赵与韩如何应付，救与不救；救则须讲求策略，救的目的是什么，救到什么程度，何时救，如何救，如何出兵，走的路线及攻击点，如何等待时机，如何作战等等，非常细致周密。又如东周、西周、宋、卫、中山诸策所载小国如何与强国周旋，不但自保平安，有时还敢从大国方面捞到便宜。这些很能给弱小国家增长志气。西汉刘向《校战国策书录》所说的“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主要就是诸侯国的外交策略问题。宋代以来，提到《战国策》就把智谋一概骂倒，都称谲诈，这未免太过分了，似宜区别对待。外交策略上面的智谋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存亡，怎么能够痛诋之为诡计呢？而上文所引王廷相的话“蓄狙诈以交外”，恰好正是这种迂腐论调。孙武及孙膑的兵法，受到全世界的重视，不但用于军事，而且用于其他方面，例如企业管理，人人尽知其为中国光辉的文化遗产，人人尽知宋襄公“不鼓不成列”之愚蠢可笑。为什么？因为战略战术的得失关系到国家安危存亡。那么，《战国策》这些讨论外交策略的史料在今天恐怕仍有可以总结、可以借鉴、可以启发思考的地方吧。

从刘向起，历代有识之士都欣赏《战国策》的文采。就是在今天，若干选篇，例如《邹忌讽齐王纳谏》（《齐策·邹忌修八尺有余》章）、《冯谖客孟尝君》（《齐策·齐人有冯谖者》章）、《庄辛谓楚襄王》（见《楚策》）、《鲁仲连义不帝秦》（《赵策·秦围赵之邯郸》章）、《触龙说赵太后》（《赵策·赵太后新用事》章）等等也早已广泛流传，还进入学校的课堂。至于把《战国策》的许多故事改写为儿童读物，收入成语典故的各种工具书，影响深远，更不必说。从文学的角度看，虽然《战国策》并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篇章也参差不齐，但在总体上，文章的思路宽广活泼，细致周密，逻辑性较强，针对性更强，犹如磁铁，吸住对方不放，以言辞打动对方，使对方听信。古希腊、罗马讲究在公共场所讲演抓住听众的艺术，古代中国，在《尚书》里面留下一些演讲的篇章，数量不多，中国讲究的是使用对话形式游说的艺术。

这在周朝的历史文献中已经显示出来，著名人物，尤其是先秦诸子，无一不是能说会道的，或成本大套，或零金碎玉，精辟深刻，引人入胜。《战国策》所记的纵横游说之士也是如此，差异只在于思想内容往往多尚功利而已。由于战乱连绵，纵横家的游说之辞，再也不是《左传》《国语》那种温文尔雅、含蓄悠闲的风格，而是简明爽朗，口语化的，带有煽惑意图的说辞。通常是单刀直入，一针见血。即使迂回婉转，用意仍是吸引对方，使自己的游说成功。许多优秀篇章，叙事生动形象，文字简练，篇幅不长，却是结构严谨完整，寓意深刻而又富于情趣的故事。注意文采，刻画人物栩栩如生，各人有各自的鲜明性格。在典型环境中，人物的处境、身份、性格特点、活动意图、言行等等都跃然纸上。人物写活了，至于善恶美丑、是非得失、功绩成败，作者都留与后人评说。游说之辞则铺张扬厉，洋洋洒洒，犹如不押韵的楚辞汉赋。历史叙事则惜墨如金，点到即止，确是史家笔法，绝不拖泥带水。《战国策》与先秦诸子一样，善用比喻、夸张、排比、骈偶等等修辞手法。常借助于故事寓言来映衬话题，而它们早已成为童叟皆知的谈助，如狡兔三窟、狐假虎威、画蛇添足、惊弓之鸟、鹬蚌相争、南辕北辙等。今日俯拾皆是的精练的词语，许多也出于《战国策》，如：争论、满意、中立、虚名、四分五裂、百发百中、趾高气扬、前功尽弃等。《战国策》自身也有或引用了一些至理名言，例如：“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故《老子》曰：‘圣人无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

《战国策》的语言艺术之中，有一件稀奇而又被人们忽略了的创造，借用今日曲艺表演的说法，叫作“一赶二”。《中山策·中山与燕赵为王》章，张登与蓝诸君的对话既是二人对答，又让蓝诸君扮演齐王来听张登的说辞。非常活泼，又比较复杂。话里套着话，现代标点必须使用到第三层的引号。《燕策·苏秦说奉阳君合燕于赵以伐齐》章也是如此。这在别的书里却是罕见。远在两千二百多年前有这样的文章，确实是难得。古典戏曲中偶一为之，不易精彩。京剧老戏《开山府》（亦

名《打严嵩》)为著名演员马连良、裘盛戎珠联璧合的拿手好戏而后继乏人，这出戏的语言艺术采用类似《战国策》这个手法而又更加扩展，而且在戏里同一套对话能够连着表演三次(其他的戏多为两次)，台词照旧而表演效果越来越精彩，成为京剧独放异彩的一绝。而这手法的嫩芽却出现在《战国策》之中。

《战国策》对于后代文学有深远的影响。楚、汉之际有蒯通，西汉初年有邹阳、主父偃等，虽然擅长纵横之术，无所用之。天下已归一统，游说雄辩主要采用策论及奏议疏表之类的形式，上奏皇帝。于是贾谊、晁错等应运而生，其文采直承纵横家，打动人主以求任用则同于游说之士。汉赋之铺陈夸饰，固然出于屈、宋，也带有游说的色彩。司马迁《刺客列传》记载荆轲事迹，笔锋饱含感情，为名家名篇之一。后人去其首尾，补入《燕策》，竟然水乳交融。再晚的文学家继承古典散文传统，显然受了《战国策》较大影响的，北宋有苏氏父子，南宋有陈亮(陈亮还受到贾谊的感染)。苏洵最为明显，就是苏轼，若干篇散文雄辩滔滔，锋芒毕露，既有纵横家的声势，也有《孟子》“吾岂好辩”的影响。后人所辑《东坡志林》的史论，既有较高的见解，又有敏锐洗练的文笔，潇洒豁达，也显示出他把《战国策》升华了之后的神采。

把《战国策》作为战国重要史料，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在今天是没有人再反对了。可是这部书的价值到底如何？

刘向是儒家的忠实信奉者，他编写《列女传》所用的精力，所表现的热忱，远远超过他为《战国策》所付出的。他从圣贤“教化”的标准出发，否定了《战国策》而肯定了《列女传》，因为《战国策》是“不可以临国教化”(《校战国策书录》)的。曾巩整理几乎散失的《战国策》，目的是“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重校战国策序》)。刘向、曾巩的这种做法恰恰反映了历代士大夫的矛盾心理状态，对于《战国策》既欣赏其文采，又害怕这一“邪说”；既想扑灭这非正道的野火，

又知道这书是毁不掉的。

《战国策》暴露了诸侯国的统治者之昏庸愚昧、荒淫无耻、残忍暴虐、骄横自负，种种丑恶被刻画得入木三分。国王、太后中的比较英明者只是凤毛麟角。诸侯的后妃、男宠、亲戚、佞信、大臣、豪门，相互倾轧，不择手段，钩心斗角，你死我活，种种丑恶比比皆是。这些事例在《战国策》中是不胜枚举的。每个诸侯国里，上上下下，一片黑暗，污秽不堪。《战国策》还揭露了当时社会的庸俗心理，羡慕权势地位、荣华富贵，借苏秦与嫂之问答，慨叹世态炎凉。也描写了若干事例，为了金钱，什么伤天害理出卖国家的事都干得出来。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秦国用金钱买动赵王的宠臣做内奸使赵王杀死李牧以亡赵国的事（《赵策·秦使王翦攻赵》章与《秦策·文信侯出走》章，后者写得极为冷酷）。商人吕不韦认为：耕田获利不过十倍，贩卖珠宝获利百倍，“定主立国”这宗买卖所获之利是无法计算的。吕不韦就做这笔大生意而获无穷之利（《秦策·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章）。当然，在战国人欲横流时期也有逆潮流而动者，例如鲁仲连就认为“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赵策·秦围赵之邯郸》章）。《战国策》着实用力宣传“士”之可贵，也描写了若干个“士”的骨头是硬的，品德是高的。游说之士多次指斥国王的儿子、亲戚、男宠、亲信等人“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连赵威后也认识到“民”（那时的涵义与今天有区别）的重要地位。这在当时是很不简单的。《战国策》所反映出来的当时的社会情况和思想情况是非常复杂的，这部书能够把这样复杂的历史事实记载得清清楚楚，活灵活现，它的价值当然很高，不容怀疑。过去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把《战国策》骂倒，并不是不知道《战国策》里也有类似儒家“士不可以不弘毅”“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但仍然要骂倒《战国策》，因为《战国策》所揭露的统治阶级的丑恶现象太多也太深刻了。因而一面骂它，一面又欣赏它，这是很奇特的。近代曾有人说《战国策》“大半是小说”。中国文学史上曾有

清末的谴责小说，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就算《战国策》是小说吧，所写的场面之大，格局之复杂，笔墨之生动活泼、简练、深刻，非谴责小说能望其项背。所以《战国策》这书，无论把它作战国历史的重要材料来看，或是把它当作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来看，它都是当之无愧的。

《战国策》的流传也曾遭噩运。

刘向在皇宫里的书库看到战国时期到楚汉之际纵横家书若干种编本，认为它们“错乱相糅杂”，于是综合各本，编为三十三篇，分别归到十二国；每国之中的材料又“略以时次之”；校定文字脱误，把这个新编本定名为《战国策》。这就是最早的定本。

由于这些材料错乱复杂，刘向虽然作了很大的努力，仍然不免有疏忽的地方，例如《韩策》里《王曰向也子曰天下无道》《或谓魏王》《观津人朱英谓春申君》三章均应归到《楚策》。还有一些篇章的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字句互有详略，这可能是刘向兼收并蓄的结果，也许是刘向校录时所谓“除复重”的工作搞得不够彻底。此外，纵横家搞权变谋诈的轶事与说辞，其中有真有假，有虚有实。刘向去战国不算太远，或许疏解得更多一些。可惜他不太重视，未置一词。当然，从具体工作来讲，刘向确实很不容易。例如《赵策》所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辩论言辞，就多与《商君书·更法》相同或近似；《秦策·张仪说秦王》章与《韩非子·初见秦》基本上一样。

《汉书·艺文志》“春秋家”收录《战国策》三十三篇，就是刘向校录编定的本子。

东汉末年，延笃（？—167年）字叔坚，给《战国策》作注释，还写了一卷评论，均已亡佚。南宋姚宏《战国策续注》引用过。

东汉末年，高诱（生卒年未详）在给《吕氏春秋》《淮南子》作注释之外，也注过《战国策》。

不知从何时起，刘向校录和高诱注释的《战国策》就散失了。

刘向编辑《战国策》所淘汰的当时流传的战国纵横家书若干种的若干篇章，后代曾有人引用。刘向定本《战国策》曾经散失，后代也有人引用。因此徐广、司马贞注《史记》，李善注《文选》，还有一些类书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及其他书籍所引用的《战国策》，或与今日流传的本子字句有差异，或为今本所无。清代王仁俊曾辑录《战国策佚文》一卷，收入所辑《经籍佚文》之中。诸祖耿于1940年修订旧作成《战国策逸文考》（收入所著《战国策集注汇考》，1985年），辑得逸文七十二条，又附一条，论证甚详。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共二十七章，十六章全然不见于今传本《战国策》，十一章文字有差异。

《战国策》在《隋书·经籍志》及以后的正史与私家书目中均著录，但篇数有出入，可以看出原书已有散失。据《崇文总目》所载，正文原三十三篇那时已缺少了十一篇，高诱注原二十篇那时只剩下八篇。

经过北宋曾巩的努力搜求，才得恢复到刘向三十三篇的数目，恐怕不见得能够搜求到已遗失的十一篇全部。显而易见的便是《燕策·燕太子丹质于秦》章乃是后人在《战国策》残缺之后，抄《史记·刺客列传·荆轲传》来补的。曾巩搜求高诱注得十篇，即第二至四，第六至十，第三十二、三十三卷的注释。

曾巩所编的本子比较完备，流传下来。

在北宋时还有集贤院本、刘敞（字原父）本、钱藻本、（苏）东坡本、苏颂本、李格非（字文叔）本、孙朴（字元忠）本、孙固本、孙觉本等。这些本子以及后来的晁以道本等早已亡佚，只知道曾本、钱本、刘本、集本的文字互有异同，刘本缺第三十一至三十三卷，钱本缺第二十一至二十五卷，集本第二十一卷与众完全不同，东坡本与曾本基本相同。

南宋初年，《战国策》有一些刻本，都不甚精。绍兴十六年（1146年）浙江剡川人姚宏访求善本加以校定，重刻《战国策》。这是流传